

《北京規劃建設》(北京:北京市城市規劃設計研究院, 2013), 148期, 2013年1月, 總148期

沒有什麼, 比美好幸福的夢想更讓人憧憬; 沒有什麼, 比可見可及的希望更催人奮進。最近, “中國夢” 這個對全世界華人有着強大感召力的字眼, 已成為一個熱詞, 它像強大的磁場一樣佔據中國人的內心, 讓年輕人充滿期待, 讓奮鬥者看到希望, 讓前行者充滿力量, 讓一個國家的復興夢想與每個人的夢想緊密地聯繫在一起。

早在1993年, 著名的哲學家、政論家、思想家梁燕城先生在海外發起“文化更新運動”及創辦《文化中國》學刊時, 曾開宗明義地提出要“重建中華民族的骨氣與靈魂”, 他說: “我有一個夢, 就是中國人再無分裂, 再無鬥爭, 却有追求超越真理的勇氣, 有對歷史過錯的悔悟, 並發展一種寬恕互諒、互敬互愛的文化, 醫治民族百多年來因鬥爭而來的深沉……我相信天地有情, 人間有愛, 不同思想可以溝通, 民族文化的過錯可以有悔悟更新, 我相信通過中西方文化的互相欣賞和吸納, 大家都能更新文化。”

“空談誤國, 實幹興邦”。19年來, 梁燕城先生只爭朝夕, 會通中西, 為弘揚傳統文化, 接續中華民族文脈, 推動東西方精華文化融合共享而覃思竭慮, 矢志不渝; 為使苦難的同胞們生活更幸福, 自由更有保障, 生命更有尊嚴而不斷呼號、奔波、奉獻。

### 哲學思辨 生命領悟

首都北京, 有人戲謔為“首堵”。上班早高峰, 車流如織, 龜行蝸步, 當梁燕城先生輾轉穿越大半個城區抵達採訪地點時, 筆者發現居然與約定的時間分毫不差。其守時的嚴謹態度, 無疑是典型的西方風格。然仔細一打量, 眼前的他, 黑色邊框眼鏡、黑色中山裝, 搭配漢字圖案特色領帶, 既不失西方時尚色彩, 又有濃濃的中國元素。這似乎正暗合其中西合璧的成長之路。

1951年, 梁燕城生于香港。母親是廣東番禺人, 活潑美麗, 多才多藝, 就讀于中山大學; 父親是廣東順德人, 高大英俊, 才華橫溢, 求學于嶺南大學。抗戰爆發後, 母親遠涉萬水千山到內陸坪石上課, 與父親結識。烽火萬里情, 在那簡樸的山野之地, 兩人建立了極美的感情, “父親每天寫一首詩歌送給母親”。大學畢業後, 喜結伉儷的小夫妻生活溫馨和美, 事業風生水起。然內戰將一家人美好的憧憬徹底改寫。逃亡香港後, 父親所有的才華和理想, 埋葬在那美麗而擠滿難民的小島, 一生屈屈不得志, 變成自暴自棄的隱者。當國內“大躍進”失敗時, 更是患上精神疾病, 經常帶淚茫然遠望北方, 口中喃喃自語: “我真正嚮往的是中原文化”。母親隻身承擔家庭的悲劇, 工作勤奮, 養育兩兒成長, 憑着在中大所學的英國文學及優良的英語教育, 在英國殖民地亦能工作立足, 負責整個香港

九龍地區的社會工作。年幼的梁燕城經常跟着母親去看望貧困的人，並留下深刻印象。“你很難想像我媽媽講英語比我還好啊！”母親常說十分感謝當時在國內能享受完全免費的教育，可惜時代風雨，報國無門。每每談及母親，梁先生又是喜悅，又是心酸。

天資聰穎的梁燕城從小就對世界的存在、人的生命非常好奇，也開啟了他一生對真理、對生命本像的追求。四歲時，他就會問：世界為什麼有這一切存在？六歲時，他和哥哥在陽台放風箏，看見日落餘暉，非常壯麗，竟感動不已。整個童年時期，他白天愛看浮雲飄忽變幻，晚上則躺在床上看窗外的星星，心中感到無比寬大舒暢。正因喜歡幻想馳騁，想象力豐富，其作文與美術成績一直很棒。

自家庭變故後，一向生活無憂的梁燕城一夜長大，學習異常勤奮刻苦，並開始探尋人生的出路，希望找到解決苦難的途徑。自十三歲始，他熟讀中國傳統文化，對儒家、佛家、道家思想，對孔孟、易經、氣功、靈界……都有了解和研究。十三歲，正是偎依在父母懷中撒嬌、在操場上與同學盡情嬉鬧的年齡，梁燕城却已開始閱讀《莊子》，也看歌德的《浮士德》與但丁的《神曲》；十四歲研究以柏拉圖為代表的古希臘哲學；十五歲研究佛經跟打坐；十六七歲開始讀道家；十八九歲讀儒家。

上世紀 70 年代，梁燕城考入香港中文大學，“那時候考中大是很難的，我們學校 150 個同學只有 2 個考上”。入中大新亞哲學系後，梁燕城師從新儒學大師唐君毅先生和牟宗三先生研讀儒道佛的哲學，從理性上了解儒道佛的修為和思想。大學期間，他被頒贈成績優異獎學金，遂決定用這筆錢到緬甸、印度和尼泊爾流浪，進一步體會佛教和印度教精神。1982 年，梁燕城入美國夏威夷大學，跟隨世界著名哲學家、現代新儒家代表成中英先生學習《易經》與中國儒學，跟隨著名的歷史學家嚴耕望先生、孫國棟先生、余英時先生等研究中國歷史，取得哲學博士資格。

研讀哲學多年，梁燕城先生有四大領悟共繪：

第一個是從佛學中領悟出來的，即人生是變化無常的，一切事物在因緣起滅中，均不具有不變的實體，這稱為空。“有了這個領悟，你就可以放得開，放得下，事情成敗、得失都沒什麼。”第二個是從道學中領悟出來的，即變中有不變，這是易經的卦爻。道家有一個名詞叫“道”，即事物發展的道路，可視為發展的規律，如一顆種子掉在泥土裏，長大後，它如果是桃樹種子則還會變成桃樹，不會變成梨樹。又如相伴多年的太太，在梁先生心目中永遠都是一朵美麗的百合花，這愛與欣賞之道，是變中的不變。第三個是從儒學中領悟到的，即人有惻隱之心，見到他人甚至生物受苦，人有不忍之心，是人的仁愛本性。儒家思想讓他知道人是有價值、有良知和尊嚴的。但良知從哪裏來？“天命之謂性”，儒家認為良知從天而來，天是仁愛本性的根源。這就促成了他的第四個領悟，宇宙的本體是仁愛的，這仁愛的本體應具有性情，即古人所謂的皇天上帝，從基督教了解上帝在人間通過十字架的犧牲，而承擔眾生的苦罪，遂決定一生跟隨宇宙的仁愛真理而活，願意犧牲自己去愛人類、愛國家、甚至愛天地萬物。

作為一個信仰的尋求者，梁燕城先生經歷了從儒教、道教、佛教、伊斯蘭教、氣功的流浪，最後成為一個基督徒，但他并不因此排斥以前追求的各教，反而更加愛護中國文化和哲理，每當想起孔孟、老庄、程朱陸王、釋迦龍樹、六祖法藏、智者大師等，都會肅然起敬，絕不因自己的信仰而有侮慢之心。至于恩師唐君毅先生，更塑造了他的人格學問，故每年新年均去叩頭請安，其逝世後，亦常懷心中，甚至夢中相見。

### 仁者風範 赤子深情

仁，是愛人，也是一切合宜的美德善行的總和。雖只短短的幾次接觸，但梁燕城先生愛國愛教的崇高情懷，謙和淡泊的儒雅氣度，博施濟眾的仁者風範，正直剛毅的錚錚鐵骨，勇猛精進的無畏精神，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洋裝雖然穿在身，可心依然是中國心！因為祖先早已把你的一切烙上中國印！”自幼熟讀中國歷史文化的梁燕城先生，雖然過去沒有機會回國，無法投身祖國的建設與發展，但一直通過書本了解中國山川大地和人民，對中國有着深厚的感情。年輕時，梁先生流浪到尼泊爾，他曾經在黑夜裏邀請來自世界各國的人們為在喜馬拉雅山另一側的中國祈禱。那時他淚流滿面，說自己到了阿里山就像到了泰山，到了瀾水溪就像到了黃河。上世紀八十年代初，在香港大專院校任教的他，當看到美國著名諧星霍普訪華與中國孩子共舞的一幕時，就許下心願，希望終有一天能教育真正生長在中國的孩子。八十年代末，梁先生來到黃河岸邊，特意抓了一把黃土包進懷裏，當地的老鄉驚問其故，他回答：“這是我祖國的泥土！”1995年，梁先生受中山大學邀請首次回國演講，心潮澎湃的他效仿猶太人的修殿節，點了九支蠟燭，紀念此事。“猶太人重建聖殿，是民族文化的大事，我也在此一生第一次回國講學，在中國百年的大難與凌辱之後，參與重建，那時就展開了文化更新的多年奮鬥。”梁先生動情地說：“若不是中國歷史與大地的呼喚，恐怕我不外仍在西方當個教授，有空時批評指點一下中國，而把自己的最高理想埋葬在北美那新奇年青的大地中。”

著名的社會學家、耶魯大學教授 Jeffy Alexander 曾提出“culture trauma——文化創傷”一說，就是一個民族、或者一群人，經過長期不斷的苦難，這個苦難已經變成他的文化詮釋裏面的故事。梁燕城先生認為這個詞較貼切地描繪了近現代中國的國情。自鴉片戰爭以來，中國受盡外國欺凌、自強失敗、

長年內戰與鬥爭之創傷，延續不斷的苦難，使整個民族有說不完的傷痛，這創傷已成為近代文化的一部份，使中國人有時反應過激，有時過于保守，以致改革開放道路艱苦而曲折。上世紀九十年代初，鄧小平同志南巡後，改革步入新階段，但彼時西方列強仍在制裁中國，前境十分迷惘，舉步維艱。與此同時，中國傳統文化在現代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戰，人們精神世界空虛迷茫痛楚，焦慮而沒有安全感，造成了信仰危機、道德危機、靈魂危機、社會危機……已移居加拿大的梁燕城先生，身處西方文化居統治地位的海外，更有切膚之感，但他不為物擾，不為威屈，放棄了屬世的榮耀和權益，憑着“知其不可而為之”的執着態度，動心

忍性，履艱忘危，在各種困難與障礙的夾縫中，以傳教士般的犧牲精神和堅定的立場，全力維護和弘揚中國文化。最初，他找來三十位志同道合的海外華人一起分享：以往海外華人，要麼罵中國，要麼親中國，但沒有人是用愛來回報中國的。他希望能走出第三條路，即用愛與參與、犧牲來回報中國，“以愛來奉獻中國，不拿中國一分利益”。結果三十個人，一人捐了一百元(約七百元人民幣)，合起來共三千元加幣，後來，他們以這三千塊錢開始籌款，得到華人的積極響應，共籌到六萬塊加幣。1994年，梁燕城和他的朋友們在加拿大成立了“文化更新研究中心”，創辦了海外華人鮮有的大型中文學術季刊《文化中國》，以探索更新中國文化之路，並提出“重建中國人的骨氣與靈魂”。他說，150年來中華民族是一個受傷的民族，“中國是我的母親，她是我歷史文化上的母親，你不能一天到晚都罵母親啊！不能鞭打母親，反而你應該去醫治她過去的傷痕。”所以他主張“以無盡的愛、無條件的愛來包容”中國，以仁愛和服事醫治中國人的心靈痛苦，繼而呼籲海內外人士關注弱勢群體，減少貪污腐敗，加強醫療和教育的保障，鼓勵青年發展，建立公平仁愛的保障體制。

文化更新研究中心是一個非牟利、非政治的文化學術機構。為了重建文化中國，梁燕城先生和他的朋友們“19年與祖國同行”。他們都不是有錢有權的人，以仁愛之心奔走呼號，集聚無數中產華僑的資金，以“文化更新運動”捐回祖國約六千萬元人民幣，用這些錢資助十多個大學的學術會議，多年來持續參與四川震區災民的心靈輔導工作，資助了6000名人次的貧困學生受教育……而他們自己，“為了貢獻祖國”，卻寧願放棄高薪，自願拿較低的薪酬。包括梁先生在內，1998年在香港建立辦公室，成為回國基地時，所有工作人員都放棄高薪(其中一位十多年獻身的總裁程女士，放棄了七十多萬年薪的工作)，大家沒有私人汽車，上下班擠坐公車和地鐵，他們不用捐款購買辦公室，而選擇一種相對清貧的生活。他們身體力行，在異國他鄉為“文化中國”建設做出了犧牲和奉獻。其實，機構成立之初，就有一家香港商業電台的總經理飛赴加拿大，以120萬港幣起薪點的年薪邀請梁燕城先生回香港當評論員。無疑，這對當時“文更”前途未卜，在機構拿着較低薪水的梁先生來說，是非常有吸引力的，十多年前120萬等如現今300萬了，再拿來投資將可發達。但僅稍作思索，他就毅然放棄了這份高薪聘請。

“反正我在加拿大生活已經不錯了，從前兩夫婦工作薪酬較高時，經母親資助，已買有一幢帶花園、面積達三百多平方米的住宅，也有兩輛汽車(這在加拿大是普通中產的生活)。拿了百萬高薪後，無非是把房子再弄大一點，地板與家具用名貴產品，開更高級的車子，這對我沒什麼意義。當時我已42歲，我需要的是把我生命的後幾十年，把自己最好的時間獻給有需要的人，把愛獻給一個曾經受苦很深的民族。13億人的靈魂重建比120萬更重要。”正因有了梁先生的堅守，文化更新研究中心的事業日益蓬勃，現在已發展到世界各地，並於1996年在美國成立美國辦公室，於1998年在香港設立中國香港辦公室。

讓愛作証 枯木逢春

19年來，梁燕城先生在中國走遍大江南北，從烟波浩渺的沿海城市，到西北遼闊的戈壁草原，再到西南葱翠的崇山峻嶺，他與最草根的農民、城市民工、寒門子弟交朋友，與最高學養的知識分子論學，也和各級官員交往。這也構成了文化更新研究中心在三個不同領域的工作內容，即領袖文化的培訓、學術文化的會通，以及關愛文化的實踐。

“我在中國與官方有更深一步的對話，主要是關於反腐敗的問題。”1997年，梁先生與上海復旦大學發展研究中心合作，開始在中國提倡廉政文化，先在海外籌款30萬元，成為惟一申請到加拿大國際援助基金的華人機構。後又得到上海政協支持，共同推動廉政研究交流。1999年，在上海及溫哥華兩地成功舉辦中加廉政交流會議。有一次半夜起來，看到上海茫茫的夜空，想起一路走來的艱辛，想起當時中國仍是落後貧窮，發展困難重重，梁先生哭得像個孩子。考慮中國腐敗問題的治本方法是重建道德，從1999年至2001年，梁先生開始在中國提倡符合新時代的道德教育，建立道德教育的教授團隊，到國家高級教育行政學院、華東師範大學、復旦大學等辦道德教育講座與培訓。也由此，他與官方的關係更加密切，並開啟了文更工作的一個新層次，1999年，梁先生被領事館推薦到中國國務院對話，其後與中央政府高層對話，包括統戰部、國務院、文化部及宗教局等，共同探討民主法治、公平正義的和諧社會方向。因為當時海外媒體一般是否定中國，而經常活躍在各大媒體的梁先生則採取比較中立的態度，平衡了很多對中國無理的批評。十三年來，對話一直在非常友好的氣氛中進行，梁先生提出了包括貧困孩子、醫療、文化發展、人權改善等內容的30多份建議書，如醫療問題，他提出能否沒錢也可看病，建議對富人收費多點，對窮人收費少點。又如教育問題，當時只有九年義務教育，未有免費，梁先生在胡錦濤到溫哥華時，寫了一個九年免費教育的建議書，由領事轉交。“現在這些都已經實現了，我很高興。這也說明政府是負責任的。”“我們完全中立，只講真話，實際上政府也想聽真話。”他感歎說：“中國的改變實在是太大了，官員的素質越來越高，官員對自身的要求也越來越高。中國的這種努力，人民向上的風氣，中國制度改革的方向都是很讓人驚喜的。”

長期以來，西藏、新疆一直是西方媒體涉及中國報道的的主要議程和輿論研究的焦點，更是影響中國國家形象的重要因素。西方在把藏獨運動道德化的同時盡力妖魔化中國政府的西藏政策，同時，把新疆問題視為是中國的人權問題，對中國一直保持着壓力。為推動世界對西藏、新疆等歷史及社會發展真相的了解、推動外界對這些邊陲地方的文化加以尊重，梁燕城先生多次向美國和加拿大政府提交兩地歷史與實況的英語論文，幫助其認識中國觀點。2008年，西藏“3.12”暴亂後，加拿大親藏獨議員向國會提交批判中國人權議案，梁燕城先生被國會外交小組邀請為中國人權狀況作證，他用英語寫了八頁中國人權報告書交給加國部長與議員，表示以加國公民入中國參與建設十多年，本身并非來自中國大陸，在中國未做生意、未賺過任何錢，以中立身份觀察中國多年，見到中國人權和宗教自由有相當大空間，雖未至完善，但在不斷改進中，自己多次參加宗教對話會議，在不同大

學教過宗教，參加過三自教會崇拜，均有自由。也親自到西藏觀察過，與藏人討論過，從未見聞到平日有何壓迫宗教與藏人現象。“相反，我在西藏看到的都是信眾們在街上叩頭敬拜，沒有受到干擾。”他還認為很多西方人思維固步自封，不了解中國：“我曾經推動伊斯蘭教和基督教在蘭州對話。對此，國會議員覺得很驚訝，他們認為宗教會遭遇中國政府的鎮壓，怎可能容許宗教對話，而我則邀請他們來中國觀察這類會議”他在國會聽証會中結論要求加國政府應先了解中國有五千年文化，像一位老人，須要尊重，而改革才三十年，像一位少年，須加以鼓勵，先尊重和鼓勵，而後可展開合理性的人權對話。結果國會擱置反華議案。國會外交小組事後發函致謝梁先生提供的數據和經驗。

近年來，梁先生多次參與中國重大歷史活動。2009年，梁先生獲中國政府邀請參加六十年國慶大典；2010年，梁先生等三位文更代表被邀出席“上海世博會閉幕式”；2011年，獲中國政協邀請，出席10月國慶典禮；2012年獲中國政協常委推薦，提名成為海外列席委員。在今年“兩會”上，梁燕城先生建議：“建立一個中華文化的共同體，儒家、道家、佛家、基督教、伊斯蘭教等都應該是這個共同體的一部分，都應該是大彩虹裏的每一種顏色。我信基督教，但是我發現我和穆斯林的共同觀點也很多。所以，各種文化應該共融，互相包容。”而出乎意料的，是加拿大政府也表揚梁先生在中國的貢獻，除了國會曾頒發獎狀外，2012年底頒發英女皇登基六十年鑽禧榮譽勳章，認為梁先生在他國的獻身，是加拿大的光榮，也對中加更深交流關係有貢獻。

本是謙謙學者的梁先生一向重視與內地高校的交流。歷年來，他多次在國內大學進行學術研究、交流、講學，以及擔任博士指導教授，包括四川大學、蘭州大學、華南師範大學、華東師範大學、中山大學及山東大學等。如2009年與四川大學合作，召開了第一屆“災難與宗教——5.12汶川大地震周年祭”學術會議；與蘭州大學合作，召開了第二屆“宗教對話與和諧社會”學術研討會；與上海大學、上海師範大學聯合舉辦了第一屆“都市發展與文化保存”國際研討會。通過交流，他發現國內學術界很活躍，學術自由度也比以前大了很多。

梁先生不僅關注與精英階層的對話，更是傾注了絕大部分的精力與心血來關注草根階層的弱勢群體的幸福。

自2001年開始，梁先生上山下鄉，到中國最貧困的農村關懷農民，到城市的高樓森林愛護民工，聆聽窮人的悲呼，擁抱失學的孩子，通過海外籌款，展開貧困兒童與青年助學，至2012年，已資助了六千名貧困家庭學生入學，並在廣西、雲南兩地建設學校14所。梁先生曾經從加拿大用了十二個小時飛到香港，幾天後由香港花三個半小時飛到昆明，從昆明飛文山半小時，下機時已是黃昏，再坐車兩小時到富寧，第二天又花兩小時入山，到達雲南中央鎮木杠小學，與學校的孩子們見面。行程二十小時，前後用了三天，做這一切是為了甚麼？梁先生說：“那是因為我愛他們。”寥寥幾字，勝過千言萬語。他覺得，雖然孩子們的生活很貧窮，但是他們的人生艱難而向上、貧窮而奮進。“我們能為他們助學，使他

們一生有前途，同時走入大山向農民學習，是我們知識分子的榮幸。”

有一次，在雲南丘北縣與文山州的高中，梁先生與其資助的同學會面。一名叫張醒的貧困高中生，送給文化更新中心一塊枯木，他把其頂的兩條樹枝塗上綠色，在主幹上刻了一句話：“愛育枯木發芽”。原來張醒以前很內向，不大與人交往，加之家境極其貧窮，故十分自卑，因此他一向自視為一塊枯木，但當文更的資助來臨，不單給他所急需的經費，而且深深地關愛他，尊重他，使他這塊枯木得到滋潤，得到生命，枯木已經發芽了。

梁先生認為，過去傷痕累累的中國亦似枯木，但當無數人以無條件的愛和犧牲，用血汗去澆灌時，祖國終於發芽，且長大成春日的樹木，生機勃勃。2009年，梁燕城先生應邀參加60周年國慶大典，當他看到游行對伍中由五千個孩子組成的方陣，走在天安門廣場前放氣球，歌唱祖國時，心情激動不已，因為此刻的他想起了自己曾幫助過的那六千個孩子。“我們只幫助了六千個人，在全國實在是很少，但起碼我真的幫助過六千人，對祖國這段歷史盡了責任。”過去在海外只是一位知識份子，一個寫書教學的教授，救國無門，真是‘無材可去補青天’，但自從投身服侍中國人民後，人生并非‘枉入紅塵若許年’，卻非常扎實和喜樂。而且學術并未因實踐退步，反而每年仍寫四篇論文，出版了十二本書(三本學術巨著仍在印制中)。

由于梁先生身体力行的影响，其家人也全部參與到服務中國的事業中來。太太是加拿大世界宣明會的得力幹將，曾在中國多年水災和地震時募捐了超過100萬加幣救災，也曾幫助雲南山區與寧夏自治區的少數民族重建家園，後來，2005年她也放棄宣明會頗高薪的工作，以她這些經驗，義務投身文化更新工作，回國上山下鄉，減輕梁先生的工作壓力。她在大學時認識梁先生，曾说自己名字是曹娟華，「華」字就代表中國，不過梁先生卻說，「華」字也代表鮮花，她是娟秀的中華花朵。女兒梁爾欣小時候常常看到父親拖着行李箱上飛機來中國，她不太明白，後來進入基督教大學就讀，其間到中國農村做志工教英語，回來後明白了中國窮人的需要，也明白父親為何放棄一切回國了、畢業後，她利用自己的語言優勢，到中國山區免費教英語。“這不僅幫助了別人的孩子，也同樣幫助了我自己的孩子。”梁先生感慨地說。在梁先生50歲生日時，女兒寫了一張卡片送給他，上面寫着：“給親愛的爸爸，多謝你多年來的教導和你作的榜樣，令我對中國也有同樣的愛心和passion(激情)，我知道你的事工(文化更新)是獨一無二的，…在這裏我想祝福作在中國的事工工。我想我可以做的，就是自己也去中國多次和鼓勵更加多的年輕人也去中國。這是我的理想。”女兒取得碩士學位後，已投身文化更新工作，每年都兩次帶志工服務貧困地區。同樣，受其熏陶，梁先生的小兒子梁爾道也加入為中國奉獻的行列，多次回國教英語。最近，他剛結束在山東烟台的一年英語支教活動。

“我在中國常用《聖經》上的兩句座右銘自勉，一句是‘愛是恒久地忍耐’，還有一句是‘愛是永不止息’。”梁先生解釋說，“愛是恒久地忍耐”就是回國後，發現中國還有很多不足和欠缺，但是并不因此否定她、詛咒她，而是永遠忍耐她

鼓勵她。愛是永不止息，則是說即使真的改不好，還是永遠愛她、寬恕她。“令我驚喜的是，中國這些年變化很大，進步很快。”梁先生開心地說。19年來，他見到最貧窮的縣城，因着公路開通，而日漸繁榮；他見到資助的城市民工子女，父母在經濟中改善了生活；他見到資助的窮學生大學畢業，變得健康活潑，且願以愛心服務其他窮人；他見到殘破落後的舊城，發展為現代都會；他見到貧寒城鎮開始開發新區，并建設了四星酒店；他見到新一代的行政領導英語水平提高，年青人則奮發向上；他見到大學教授的朋友，由六百元月薪到搬入一百多平方米的新居；他見到報刊、媒体及普通百姓從小心講話到放胆直言；他見到大學可以自由發表學術觀點；他見到不同宗教間可自由而和諧地對話……

### 人文城市 精神樂園

當中國躍居全球 GDP 第二位時，我們曾有國短暫興奮，隨即陷入沉思：經濟的繁榮，帶來俗世的迷惘；城市的繁華，正摧毀着最可珍貴的文化遺產。對在香港長大的梁燕城先生來說，古都北京宛如夢幻中的世界。時隔經年，他仍清晰地記得，1982 年第一次回國，當走入嚮往已久的京城時，最難忘懷機場舊路兩旁的白楊樹、宏偉而又殘破的長城和故宮，以及滿街川流不息的自行車。北京很老，但很美，恢宏壯麗，如夢如詩。及至今天，北京已是高樓林立，汽車如織，廢氣瀰漫，成功發展的代價，是“失去了純樸和優美，使人和文化失去了靈魂”。梁先生說，後現代的西方城市建築中，人們用鐵窗、鐵閘把自己鎖在屋內，豪宅更建成堡壘一樣，城市因富足帶來精神荒涼，結果形成“枷鎖城市”。他呼籲，中國不要陷入西方城市的相同困境中，五千年的文化古國應有一個“人文城市”的理想。

建設人文城市，首先需要規劃好人文空間。梁先生認為，除了科學上的物理空間外，也存在着一種社會與文化上的建構，即“人文空間”。城市中的人文空間是一個交錯互動的世界，城市設計中，如能建立一個和諧美善的人文空間，可以使不同階層的人幸福快樂。

梁先生強調，作為關係性的身體，在城市空間中運動，其所處的位置和社會關係，決定了其地位與尊嚴。如在北京上下班高峰時段，躋身于地鐵或公交車中，人身體幾乎不能移動，而且男女身體擠貼在一起，兩性之間沒有分別，身體沒有了私密性，人也失去個人獨立的尊嚴。坐在出租車之中，或由司機駕駛的空調私家車中，身體的空間位置就代表了不同的社會地位。住在民工的狹小單位中，其身體空間與住在豪華別墅中，當然完全不同。人成長的空間，其社會地位構成的物理環境，極大影響了人對自己的認同及其心理的狀態，如階級、種族、學識等，均使人在身體上有不同的表現。因此，梁先生建議，在做城市規劃時，必須依據空間正義的原則，來開展用地的方案，使弱勢者得到與富足者接近的尊嚴。最低限度不以低價搶奪貧困人的土地，以滿足地產市場的需要。如北京向外發展到五環六環時，規劃須考慮建立民工住宅區，使民工有符合環保要求的、兒童可以活動和受平等教育的空間。其間有民工的投訴機制，當其受剝削壓迫時，可在區內信

訪，其尊嚴與權利得到黨與國家的保障。只有這樣，城市才能真正成為人們的精神樂園。

為避免城市變成精神文化的荒原，梁燕城先生提出，在編制城市規劃時，須特別成立一個小組，先請學者詳細研究城市的靈魂，特別是精神文化的特質。從其歷史事件、文化學術、生活特色、古老建築、藝術表達、傳統小巷與商店等，了解人民的精神表現，掌握整體的文化表現，進而保留歷史建築、藝術風格、生活特色，保障和發展少數民族的文化價值等。

梁先生飽含深情地說：“我夢想一個人文的北京，一個有靈魂、有文化、有正義的北京。”他希望，以天壇為中心，代表自古中國對宇宙終極真理的尊敬，以地壇代表保育大地的綠色理想，以天安門與故宮代表數千年歷史，以圓明園代表近代的掙扎，以黨校中的耶穌會士墓代表中西文明的交匯，以北大清華代表現代文化的吸收，以“鳥巢”與奧運村代表後現代的北京，以天安門廣場代表後後現代的多元和諧，建立城市中的公眾互動對話空間，使古今中外交融，成為中西文明融滙的未來指向。也希望作為全國首府的北京，能成為世界文化對話的全球公眾空間。

人生因夢想而美麗。19年來，梁燕城先生懷揣夢想，帶着對中國大地與人民的親情，帶着真善美愛天地之主的恩情，堅定執着，與祖國同行，為國家分憂，我們相信，在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激動時刻，有了眾多像梁燕城先生這樣的炎黃子孫為“中國夢”添磚加瓦，夢想一定會照進現實，中國的明天會更美好。